

危机与应对：曾国藩与近代皖南茶税厘革考论

盛海生 周晓光

(安徽大学 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31)

【摘要】咸丰十年(1860),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并督办皖南军务期间, 因“咸同兵燹”客观形势的逼迫, 即着手改革皖南茶捐茶厘的征收, 将其视为解决皖南驻军军饷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其核心措施包括任用专职人员, 设置茶厘分局等管理机构; 制订章程, 明确规则, 强化管理, 颁行《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 “软”“硬”兼施, 捐、厘分征等。这些厘革举措, 为缓解军需之虞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效果甚为明显。同时, 曾氏皖南茶捐茶厘的征收改革, 也带来了华洋茶商勾结以规避茶厘以及纠纷处置乏力而致乱象整治成效低下等遗害。曾国藩在皖南茶捐茶厘税的厘革, 体现了晚清权力体系和业茶者之间的利益博弈, 也是我们考察晚清财税史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视角。

【关键词】曾国藩; 皖南; 茶税; 变迁; 应对

【中图分类号】S-09; 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3-0101-12

Crisis and Countermeasures: Zeng Guofan and the Reform of Tea Tax in Southern Anhui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SHENG Hai-sheng ZHOU Xiao-guang

(Center for Hui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1)

Abstract: In 1860,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Xianfeng, Zeng Guofan was appointed as the governor of Liangjiang and supervised the military affairs of southern Anhui. Compelled by objective circumstances of the War Havoc under the Reigns of Xianfeng and Tongzhi, Zeng Guofan started to reform the collection of tea tax in southern Anhui and regarded it as the most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military pay and provisions of the garrisons in southern Anhui. Its core measures included appointing full-time staff and setting up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Tea Tax Branch; formulating and clarifying rule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and issuing The Ten Articles of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The Tea Voucher, Levy and Tax of the Exported Tea; adopting a carrot-and-stick approach, collecting tea levy and tax respectively and so on. These measures provided safeguard for easing the crisis of military supplies, and the effect was very obvious. Besides, this reform also brought about the legacies like the collusion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tea merchants to avoid tea tax and the ineffective disposal of disputes, which results in the low effect of chaos control. Zeng Guofan's reform of tea tax in southern Anhui reflected the benefit gambling between the power system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ea traders, and offered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s to analyze the history of finance as well as taxation and the business activities of mercha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eng Guofan; southern Anhui; tea tax; transition; coping with

[收稿日期] 2020-07-2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商业变迁与徽州商人转型研究”(19JJD770001)

[作者简介] 盛海生(1977-), 男, 历史学博士,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徽学、中国近代经济史; 周晓光(1964-), 男, 历史学博士,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徽学、明清史。

皖南地区向来“山多田少”，重峦叠嶂，宜于植茶^①。早在唐杨晔《膳夫经手录》已云“婺源方茶，置制精好”，实系“赋税收入，商贾所资”。自宋迄明，皖南茶商“给引征课”，“清因之”^②。近代中国外患内忧接踵而至，一面列强武力扣关以求通商；另一面太平天国兵起广西，“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③。皖南距离金陵（今南京）近在咫尺，因时易世变，暴风骤雨式的“变迁”深刻影响了皖南茶叶产销乃至税收厘革。学术界有关近代皖南茶叶种植、管理、烘焙、运销乃至相关个案等研究成果甚为丰硕，然对其茶厘捐税厘革背景、举措及评价等却鲜有关注^④。本文从社会“变迁与应对”的视角，探讨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之际皖南茶厘捐税厘革的背景、原因及举措，进而考察权力体系与业茶者之间的利益博弈，以期对近代皖南茶税厘革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一、咸同兵燹：曾国藩与皖南茶税征收缘起

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令曾国藩署两江总督，七月督办皖南军务。此前，皖南茶叶除“给引征课”外，出境运售尚需缴纳额度不等之常关税，如途经江西卡局入粤需缴纳常关税约每百斤一钱三分^⑤，抵广州外销再纳出口税约每担一钱五分^⑥，于总额来看，还算轻薄。咸丰三年（1853），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设关始征茶厘^⑦。是时，兵燹祸至皖南等地，学臣沈祖懋仿闽浙之举而开茶厘，皖南道茶捐厘税之征则以徽州所辖六县为重。咸丰五年（1855）五月，因徽防渐坏，已被褫职的张芾经王茂荫奏请，奉旨督办皖南军务，并于徽属设局，抽收盐、茶各项货厘，计于正课外加茶厘银六钱。不过，沈、张二氏茶厘之征因缺乏具体的激励举措和相应规章而成效并不明显。直至咸丰九年（1859），据李桓奏称，“嗣后徽茶一项拟照义宁州茶捐章程，每百斤收捐厘银一两六钱，起票之卡收捐输银一两四钱，准给奖叙，验票卡所收银二钱”，^⑧皖南始仿江西“分别茶厘、茶捐”之举，以示激励。曾国藩督办皖南军务伊始，对皖南茶厘茶捐情况即密切关注。我们注意到其日记在当年十一月、十二月附记了皖南牙厘局两项捐输报告：

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初八日：

廿六次厘金：一十六万三千七百两；六万二千串文；

九次茶捐：九万六千两；

十一次厘税：四万七千五百六十两。^⑨

① 文中“皖南”一词，就地域而言，主要指雍正年间形成的五府一州。但晚清皖南以徽州府所产红、绿茶外销为主，其他茶叶则主以内销。故文中考察范围事实上以徽州府为主要区域。

②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3651页。

③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6页。

④ 目前学界关于皖南和徽州茶税梳理与研究成果主要有曹自强《皖南茶税税则述略》（《黄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黄山市文史（第3辑）》，黄山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93年，第44—47页）；陈勇《晚清时期的茶税与徽州茶叶贸易》（《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袁飞《试论清末皖南的茶厘与茶厘局》（《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张玲、丁以寿《晚清、民国安徽茶叶商税之沿革》（《农业考古》2011年第2期）；郭丹英《从茶博馆捐照、厘照、监照看晚清的茶政》（《第九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暨第三届崂山国际茶文化节论文集》，出版社不详，2006年，第229页）；傅为群《从徽州到上海：晚清茶商“洋庄落地税照”解读》（《上海文博论丛》2007年第2期）；张金栋《曾国藩等致姚体备信札考释（中）》（《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等。以上论文对皖南茶税税率演变、茶税政策、皖南茶厘局设立以及茶捐照等实物展开探讨，但目前将皖南茶税饷需筹措之举置于晚清社会变迁背景下予以综合考察的成果尚付阙如。

⑤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进广誉清帐册》，转自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⑥ 叶松年：《中国近代海关税则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26页。

⑦ [清]赵尔巽：《清史稿》卷124《食货志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3653页。

⑧ 李桓：《徽茶捐厘章程申》，咸丰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宝书斋类稿》14卷，武林赵宝墨斋版，1969年，第577页。

⑨ 曾国藩：《日记附记》，咸丰十年十一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17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98页。

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十四日：
厘金共卅三次，银十八万八千七百两，钱十一万二千七百串；
茶捐共十一次，十万零三千五百两；
盐税共十四次，五万三千四百两；
牙捐共六次，一万六千九百九十两；
洋药共五次，八千两。^①

曾氏日记特别附记此两项捐输报告，颇耐人寻味。虽然日记中并没有特别诠释个中缘由，但该信息透露出曾国藩对皖南茶厘茶捐的密切关注程度。这种关注，与咸同兵燹中的皖南战事及军饷筹措紧密关联。

曾国藩认为，“徽、宁、池、太等府，处处与江、浙毗连，地方辽阔，袤延七八百里”，形势极其扼要。但其时“一片逆氛，几无完区”。防务、饷需两相交错，致“徽、宁两防，……绸习已深，旧欠过多，新饷尤缺。不裁汰则口食无资，一裁汰则变态百出，办理棘手，一言难罄”^②。面对“徽、宁既失，皖南糜烂，仅存祁、黟等一二县”的既存现实^③，曾氏在复信相关幕僚及左宗棠时多次表达了饷需奇绌致心急如焚之情。如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六，他在给王霞轩的信件中表达：

每月须银十八万有奇，而左军在外，陈军在外，吴军在外，鲍军新添之二千四百在外，新调之蒋香泉、魏喻义、李金旻等军皆在外，实不知所以善其后。^④

是年五月初十日，他复信李桓指出：

惟欠饷过久，祁、休各军已无固志，……厘金茶捐，全恃地方肃清，目下扰攘如此，实深忧灼。^⑤

同年六月初八日，他复信左宗棠再次言及：

尊处而欠饷过多，鄙人且忧且愧。……古人谓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窃谓军营缺饷，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顿断者，亦瓦解也。^⑥

综合各件所言，因兵燹防务“每月须银十八万有奇”，但由于各种“厘款日绌”致军费“欠饷过久”实属现实，乃至部分驻军“已无固志”，致其“实深忧灼”。曾氏非常清楚此刻若“军营缺饷，其拖欠者，亦土崩”。在曾国藩看来，饷需筹措是当务之急更是因应之策。因此，曾氏督办皖南军务之初对茶厘茶捐的密切关注，正是军情与饷缺使然。

而这一点，又与皖南“徽州向不产米”^⑦，田课正赋不足，但因盛产茶叶带来的巨额茶厘茶捐有关。危局困境之下，曾国藩将茶厘茶捐视为解决皖南驻军军饷问题的重要途径。如，他给左宗棠的信件中曾谈及：“婺源人心风俗皆纯厚，物产亦丰饶，团练大可护持，将来贵军入皖，请办婺团，以为始基，婺茶岁入十余万金，或全用为团练之资本，可得数千劲旅。”^⑧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七日，他又复信左宗棠称：“婺源虽在万山之中，名区也。城小而坚，地广而物众。每年茶税、正饷、盐厘，可得二十万金。贵军以景镇、乐平为

① 曾国藩：《日记附记》，咸丰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109页。

② 曾国藩：《遵旨斟酌进兵兼顾皖南军务折》，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册，第541页。

③ 曾国藩：《复胡林翼》，咸丰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134页。

④ 曾国藩：《附致王必达》，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121页。

⑤ 曾国藩：《复李桓》，咸丰十一年五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07页。

⑥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六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43页。

⑦ 曾国藩：《复胡林翼》，咸丰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39页。

⑧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78页。

后路,以婺源为家私,必可立于不败之地。在贵军则根基甚固,在大局则屏蔽甚广。”^①将茶税置首,说明曾氏清楚认识到皖南茶厘捐税对于补足军饷的重要性。

对于当时业已开征的皖南茶厘茶捐,曾国藩认为仍存在诸多问题,尚难解决军饷不足的现实困境。他曾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致左宗棠信中说:“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筹饷以厘金为最便。如自设厘卡数处,则虽万人而尚可敷衍;若并无亲设厘卡,则虽七千五百人而终亦饥饿。钱武肃王征榷最重,而其兵甚强,其民亦不甚怨,可见征商胜于征农。”^②这里表明了曾氏的基本态度:一是军队必须亲自筹饷,二是筹饷以厘金为最便,三是自设厘卡,四是征商胜于征农。此后,曾国藩关于皖南茶厘茶捐的厘革,大体按照这一思路展开。

二、建章立制:曾国藩与皖南茶税厘革举措

鉴于皖南防务不治与捐厘征举不足的现实,曾国藩认为,若非因事制宜、对症下药、措置得当,饷源无法保障,防务必定收效甚微。为此,他煞费心机、殚精竭虑并积极应对,出台的茶税厘革核心措施包括:

其一,任用专职人员,设置相应管理机构。曾国藩曾鼓励左宗棠于婺源征收茶厘捐税以解军饷不足。但事实上,他非常明白随地随征之策只应燃眉之急,绝非长久之计且于大局益处有限。因此,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氏致信左宗棠:

徽州之地丁、盐茶、杂厘,每年可入五十余万金,而婺源岁课二十万,于军饷大有裨益。请阁下择贤者为婺令(典斋可为否),自为经理,自济贵军之饷。^③

曾氏提醒左氏要早自为计,“择贤者为婺令,自为经理,自济贵军之饷。”显然,他已意识到没有专门人才经理捐输则军饷奇绌问题无法得以迎刃而解。是年二月初八日他又复信李辅堂特别叮嘱:“牙厘盐茶四事,得宏才综理,纵不能十分鬯旺,将来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自可徐起有功。”^④三月二十三日曾氏致信左宗棠,再次强调任用专职人才:

婺源日内正值茶市畅旺之时,……婺源之茶、屯溪之厘大可济饷,其婺源县,亦请由贵营委员中选择一人。^⑤

鉴于欠饷现实及地方厘捐征收存在的种种弊病,经审慎考虑,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曾氏终呈《遵保皖南镇道折》,特别奏请幕僚姚体备署理徽、宁、池太道并兼管屯溪厘卡^⑥。不久还专门致信嘱托左氏:“屯溪亦拟于日内兴办,由皖南姚道会同祁门粮台作主。秋浦正派而有血性,志欲补救时艰,于台端向慕尤殷。诸事有相交涉者,望阁下扶翊而玉成之。”^⑦

除安排专人管理外,曾氏亦重视相应机构的设置。据《祁门县志》载,同治元年(1862),徽州各属县设立茶厘分局,“祁有茶局自是年始”^⑧。最初皖南茶厘征收乃归安徽牙厘总局兼办而无特设专门机构管理,后鉴于茶厘在皖南厘捐中比例之高,曾国藩于同治元年在徽州特置皖南茶引局(亦称皖南茶厘局)。总局驻休宁之屯溪,相应徽府六县、池州府石埭及宁国府太平设分局,并于坎厦巡检衙门、深渡、街口等

①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137页。

②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37页。

③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159页。

④ 曾国藩:《复李桓》,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170页。

⑤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294页。

⑥ 曾国藩:《遵保皖南镇道折》,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全集》第3册,第109页。

⑦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七月初四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67页。

⑧ 江苏古籍出版社:《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设分卡^①。各茶厘分局“札委各县知县或委员绅士办理”^②,后改“江督主政。”^③

培育专职管理人才及对特设机构的重视皆具有重要的意义。曾国藩牢牢地将专职负责的皖南道官员任免权掌控于己,姚体备、叶兆兰、吴坤修、刘传祺、冯志沂等均由其奏请并相继赴任,对厘捐之征收保障至关重要。加之机构设置的保障,人事与机构共同构成了未来区域征举管理的主体,皖南茶税征收取得了不俗之绩。

其二,制订章程,明确规则,强化管理。督办皖南军务初始,曾氏因事务繁忙、时间仓促,茶捐厘税征收延续张芾之旧标,即“每引六钱”,后增至“每引捐银八钱”。不久,即咸丰十一年十月,曾国藩颁布新章规定:“每引九钱内,六钱名茶捐,给照给奖,三钱名茶厘,给予厘票;府县各收三分,余八钱四分充饷”。考虑到时间仓促,内容或有不妥,曾国藩特告诫幕僚姚体备试行并“随时更改”^④。

为明确规则,进一步强化管理,经多方斟酌修补,同治元年五月《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准备试行^⑤。此章程对相关机构设置、茶引正课、捐厘征收额度、关卡设置、办公经费征收、捐与厘分征、洋庄篓熟茶征税标准、小贩及零星税额等一一详细规定^⑥。是年五月十日曾氏在日记中载有,“将茶引、茶捐、茶厘三票细核一过,将使皖南茶务定一画一章程,庶使官商两便,薄暮核毕”;次日他再次载言“酉刻,核改告示稿,札稿,即昨日所定茶引章程也”^⑦,可见曾氏对此章程十分重视。该章颁布后只是在同治二年(1863)稍修“每引加捐银四钱”^⑧,后多沿之并逐渐成为定章。以征收额度为例,“章程十条”将之细化为引、捐、厘、办公费四项,每引共计2.08两,同治二年又续劝每引加捐四钱,合计各项2.48两每引。此一额度后虽经曾国荃、刘坤一等奏请稍有减少,但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依然每引2.24两,亦足见章程对规范皖南茶捐厘税征收影响十分明显^⑨。光绪年间歙县毕体仁撰有《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毕体仁,名树忠,号静齐,毕氏业医、兼营茶事)文书一册,对于曾氏颁发皖南茶捐执照、征收捐厘载述详备,可谓之脚注。毕氏称自己主管的茶行于同治二年(1863)奉两江总督曾国藩令,仿湖北、江西变通新章,捐库纹银一百两计划申请中则执照。同治三年(1864)三月,正式获领两江总督颁发的牙捐执照,直至日后部贴颁到^⑩。可见“章程十条”颁布后,原由户部颁发并藩宪主管所用各色牙贴“捐项照章补足”后“概不行用”,暂改由两江总督督办皖南牙厘总局直管,执照由两江总督颁发。后直至同治八年(1869),户部颁发户贴并晓谕各商“将牙捐执照呈缴更换”,至此,皖南茶税管理基本迈上正轨。

其三,“软”“硬”兼施,捐、厘分征。缘于军事斗争形势所迫,茶捐、厘征收伊始,曾国藩采较为强“硬”之策。咸丰十一年六月,在兼管皖南军务已近一年之际,曾氏致左氏信件中还特别提醒:“尊批驳飭婺源

① 叶羽:《茶书集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47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7页。

③ [清]冯煦修、陈师礼纂:《皖政辑要》,黄山书社,2005年,第345页。

④ 曾国藩:《复姚体备》,咸丰十一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465页。

⑤ 按:传忠书局稿本《曾文正公全集》将《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置于同治六年项下,岳麓版《曾国藩全集》引传忠书局稿本,但添加脚注认为《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具体时间不详。笔者查阅《曾文正公全集》有关曾国藩年谱之际发现,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载有“核定皖南茶引捐厘章程,出示晓谕茶商,期归划一”一条;另,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和十一日,曾氏在日记中亦连续记载有“将茶引、茶捐、茶厘三票细核一过,将使皖南茶务定一画一章程,庶使官商两便,薄暮核毕”以及“酉刻,核改告示稿,札稿,即昨日所定茶引章程也”二条。据此,笔者认为《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应该于同治元年五月左右制定并试行。

⑥ 曾国藩:《洋庄茶引捐厘事宜管理章程十条》,时间不详,《曾国藩全集》第14册,第470-472页。

⑦ 曾国藩:《附记》,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17册,第109页。

⑧ 《重修安徽通志》卷78《关榷》,光绪四年刻本。

⑨ 傅为群:《从徽州到上海:晚清茶商‘洋庄落地税照’解读》,《上海文博论丛》2007年第2期,第76页。

⑩ 毕体仁:《薛坑口茶行屋业本末》,王振忠主编:《徽州民间珍稀文献集成》第2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19页。

厘务,至为切当,批乐平绅董禀尤为痛快。乐平刁抗之习,当以雷电发其聋聩,以猛剂起其沉痾。该处虽感公德,仍望以威慑之。米厘、盐厘、茶厘均可加重,不独婺源为然。”^①可以想见其筹措捐、厘实属不易。直至同治元年六月,曾氏依然告诫姚体备,若“茶商夹带他物,章程虽未议及,只要所带之物照常完厘,亦可并行不悖。若借此偷漏,随时查出,即予严惩”。^②

当然,严苛绝非长久之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曾氏亦相当恤商与护商。同治元年五月,其致姚氏信件就此展开专论,对于洋商“请商伙入内地办茶,势不得无栖止之所,但照中国商人一体完厘,即于中外各例均无违碍。……令照常完厘,既经查明,不宜另有苛索。”而对于华商“巨款势难一时缴出,不妨全数豁免,以广招徕。……务恳阁下曲体商情,认真办理。”此外,对于地方敲诈勒索者则“咨请鲍军门严拿查禁,冀恤商柔远两得其平。”因为曾氏深知画地为牢:“大约我之稽查防备愈严,彼之绕越偷漏愈多。不如概归产茶之处将茶引、茶厘、茶捐三者并收,每引增至二两有奇,则得饷较多,而奸商亦不能出此范围。”^③

为鼓励业茶者多交捐税,曾氏还特别强调捐、厘互异,切不可一视同仁:

运茶出境,逐卡抽收谓之厘;办茶到栈,按引输纳谓之捐。……明乎茶捐之与茶厘本自不同,若概以厘金目之,则捐款尽成虚掷,实收又不能追还,将何以取信于商?……此项茶捐实于引厘之外另行加捐,并非以厘金请奖,敕部将前次议驳之案仍照原单准给奖叙。以资激励而示招徕。^④

为此,曾国藩与李鸿章、马新贻还先后 18 次为皖南茶捐者请奖。其奏为皖南茶捐征收提供了难得的详实数据(见表 1)。

表 1 咸同年间皖南茶捐征收统计表

年 份	征收标准	实收数目(两)
咸丰七、八、九、十年	一引:抽税厘银九钱三分	161690
同治元年至二年十二月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37898.006
同治三年二月至十一月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22204.3922
同治三年十一月至四年五月止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65216.645
同治四年六月至五年正月	一引:抽捐银 1.2 两	188471.978
同治五年二月至五年六月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67867.349
同治五年六月至五年十二月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64884.01
同治六年正月至六年三月二十日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64884.01
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一至六年九月十日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18974.307
同治六年十月起至十二月底止	一引:抽捐银 1.2 两	335780.8636
同治七年正月至七年五月二十日	一引:抽捐银 1.2 两	288952.7161
……	……	……
同治八年十二月至九年四月十五日	一引:抽捐银 1.2 两	325670.8934
同治九年四月十六日至九年十一月底	一引:抽捐银 1.2 两	434260.884
同治九年十二月至十年六月底	一引:抽捐银 1.2 两	389828.5882

资料来源:(1)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 8、9、10、12 册,岳麓书社,2011 年,第 284、205、206、473、591、96、197、266、446 页;(2)高尚举:《马新贻文案集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276 页;(3)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第 2 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年,第 356、437、485 页。

附 注:(1)咸丰七、八、九、十年,张芾督办皖南军务期间,在前课基础上每引加捐六钱,表格中系茶捐参数;此后,

① 曾国藩:《复左宗棠》,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全集》第 24 册,第 456 页。

② 曾国藩:《复姚体备》,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曾国藩全集》第 25 册,第 353 页。

③ 曾国藩:《复姚体备》,同治元年五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 25 册,第 276 页。

④ 曾国藩:《陈明皖南茶捐与茶厘不同片》,同治四年正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 8 册,第 206 页。

捐费标准系参照《徽宁池三府属洋庄茶引捐厘章程十条》；(2)因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年请奖资料缺佚，表格未能予以统计。

由上表可知，就征收数额而言，仅捐输请奖1项，每年实收高达20万至40万两之多。曾氏的前后“硬”“软”兼施之策，捐、厘分征之举，若就捐输数额而言，还是取得了应有的效果。

三、得失参半：曾国藩与皖南茶税厘革的评价

因咸同兵燹锋镝侵扰，皖南茶商罹难和财产损失等种种不幸，令人“悬心吊胆”，确属事实。不过，是时因国际市场茶叶投机等因素促动，“沪价每引得银五六十两、三四十两不等，商人获利尚厚”，故荆棘塞途中自不乏人^①。如婺源孙华梁“值粤逆蹂躏，梁从间道运申获利”^②；歙县江文缙将“所代理之茶叶，年年均往上海销售”等^③。正如外商所言：“清廷及太平战争方殷，而商人（茶商）则出入锋镝之间，悍然不顾。”^④期间，曾国藩为确保军需，对皖南茶捐厘税的厘革委实不易且几乎成为后来定制，不过，因时局变迁，亦遗害不少。

首先，茶税厘革对解决军需确有辅助作用。厘金本为筹措军饷“榷百货而税之”的临时举措，非户部经制之款，属外销款项之列。地方督抚大员时常因“正项既不足养兵，必须厘金济饷”^⑤，往往视其为利藪，对税源大宗的盐、茶等更是设专局经办。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邓海波甚至直接视曾氏此举“为其充裕军饷”^⑥。据民国陆藻估计，曾氏督办两江期间，皖南茶厘捐税征收约计“每年征库平银三十三万两”^⑦。可见，在其积极筹划下，皖南茶捐厘税抽收不菲，对解决兵燹期间军饷匮乏以及后来军需确有一定帮助。譬如，据曾氏奏报显示，自擢两江总督至金陵克复止（1860年5月至1864年6月），除兵燹已支费用外，府库仍实余皖南茶捐厘税等共计四十二万三千一百二十三两四分一厘四毫^⑧。同治四年（1865）五月至七年（1868）八月，其与李鸿章督办剿捻事宜期间，有据可查的皖南茶捐厘税提供饷银至少三次，共计九十四万九千五百五十两，为缓解军需之虞提供良好保障^⑨。此外，兵燹后，部分地方留防军亦同样享受皖南茶捐厘税的款项拨解，如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至是年十二月止，其共拨解银一十九万五千五百两供江苏留防军军需^⑩；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三十日，皖南茶捐厘税再次为其拨解饷银二十五万四千五百两等等^⑪。值得一提的是，同治七年八月，曾氏擢直隶总督后，因感吏事、军事等诸多蔽茶，试图振兴。不过，限于“直省库款动须报部”的掣肘，故于经制款项外，“别求生法”。随后在厘定的四条举

① 曾国荃：《请免加茶课疏》，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一日，《曾国荃全集》第2册，岳麓书社，2006年，第316页。

② 《婺源县志》卷42《义行八》，民国十四年刻本。

③ 原件现存歙县江氏后裔处，转自张海鹏、王廷元：《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2页。

④ [英]裘昔司：《上海通商史》，程瀚译，商务印书馆，1915年，第83页。

⑤ 李鸿章：《复朱学院》，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李鸿章全集》第29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13页。

⑥ 邓海波：《中国历代赋税思想及其制度（下）》，中正书局，1984年，第600页。

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07页。

⑧ 曾国藩：《造报历年军需收支款目分四案开列清单奏请报销折》，同治六年二月初八日，《曾国藩全集》第9册，第364页。

⑨ 参见曾国藩：《湘淮各军剿捻军需报销折》，同治十年八月初一日，《曾国藩全集》第12册，第434页；曾国藩：《湘淮各军剿捻军需四年闰五月起至五年底止报销折》，同治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全集》第11册，第319页；曾国藩：《湘淮各军剿捻军需第二案报销折》，同治十年二月初二日，《曾国藩全集》第12册，第213页。

⑩ 李鸿章：《江苏留防军需第二案报销折》，光绪元年二月初六日，《李鸿章全集》第6册，第243页。

⑪ 左宗棠：《江苏留防军需第十案造册报销折》，光绪八年十二月十七日，《左宗棠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4年，第178页。

措中,“榷皖南茶税”赫然在列^①。可见,曾氏对其“收数颇旺”依旧念念不忘^②。

其次,茶税厘革对两江督抚政务经费不足可起到部分缓解作用。兵燹之后,户部经制之款十分有限。两江督抚辖区范围内,如河工、赈务、赔款乃至教育经费等时有乏匮,为应燃眉之急,皖南茶捐厘税遂成为重要行政手段。譬如,同治八年(1869),皖省遭遇水灾,沿江堤岸被毁严重,两江总督马新贻试图以工代赈重修被毁堤岸,不过囿于“江省协拨各处军需已属入不敷出”,故于“无可设法中竭力筹措”,后饬皖南茶捐局协拨银四万两以便融通^③。再如,光绪二十年(1894),中东战事起,两江总督刘坤一奏徽茶“每引暂加银三钱六分”二成捐以供急需^④。又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夏,皖南遭遇水灾,屯溪公济局绅董洪廷俊等人奉两江总督端方饬令迅即“筹拨湘平银一万两”散放灾区^⑤。其四,宣统二年(1910),为推进茶叶改良,两江总督张人骏依然奏请于宁(南京)设茶务讲习所,其“开办及常年经费,均由皖南茶税局拨支”等等^⑥。

揆诸史实,特定时期,曾氏的皖南茶捐厘税建章立制的厘革,对于缓解军事饷需和政务经费不足确有一定的弥缝苟且之用。然而事实上,曾氏此举对于皖南茶商后续发展亦遗害不轻,成为晚清权力体系和业茶者(茶户、茶行、茶栈、茶号等)利益博弈的滥觞。

首先,因皖南茶捐厘税苛重,致华洋茶商相互勾结以规避茶厘的现象屡见不鲜,且整治成效低下。厘金开征后,华商商品出境逢卡抽厘。近代徽茶外销主要聚集上海、汉口等地。徽茶运销两地,因茶捐及抽厘,华商负担较洋商为重。就上海而言,徽茶运输主要有两条线路,一路由婺源运至九江后转至沪上,另一路由屯溪经杭州、宁波后转运至上海。据外商观察,期间运输捐税总额往往高出子口税约一至三倍。^⑦以光绪元年(1875)徽茶途径杭州、宁波至沪为例,其具体费用如下(见表2):

线路	徽州-杭州-上海	徽州-宁波-上海
费用	运输水脚费:关平银0.45两	运输水脚费:关平银0.95两
	洋庄落地税:关平银2.07两	洋庄落地税:关平银2.07两
	各种捐税:关平银1.63两	各种捐税:关平银0.13两
	出口税:关平银2.50两	出口税:关平银2.50两
合计	关平银6.65两	关平银5.65两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 甬海关 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166页。

附注:据《徽宁池三府属洋庄茶引捐厘章程十条》和次年徽茶捐税补充条款知,徽茶落地税为2.48两每引(1引约120斤),表格中落地税系数是海关据担(1担约100斤)折算而来。

此外,徽商运销茶叶至汉口各项费用,基本情况如下:

各项费用	(单位:海关两)
茶叶的实际成本·····	4.00至12.00
种茶人的捐税·····	0.51至0.51

①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2册,岳麓书社,2013年,第1221页。

② 曾国藩:《复英翰》,同治七年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30册,第329页。

③ 马新贻:《皖省水灾江堤冲决筹款兴修以工代赈片》,同治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马端敏公(新贻)奏议》第2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8辑,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823页。

④ [清]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考·榷茶》,民国景十通本。

⑤ 《督宪端札江南赈捐局筹拨银两电汇屯溪助振文》,《南洋官报》1908年,第121期第47页。

⑥ [清]刘锦藻:《清续文献通考》卷120《学校考·学堂》,民国景十通本。

⑦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08页。

子口税,或半税·····	1.31 至 1.31
慈善捐·····	0.10 至 0.10
装箱、木箱、铅罐等·····	2.00 至 2.00
烘培与装箱·····	2.00 至 2.00
利息,约 10%·····	0.15 至 0.15
运至港口搬运费·····	0.70 至 0.70
贩茶人在卖于外国人之前的全部成本·····	11.77 至 19.77 ^①

比较而言,为“体恤洋商”^②,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子口半税则议定(洋商购买土货运销并未明确),不过华商从未享受如此便宜之税则。^③结果“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槁满载,卡闸悉予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篋翻箱”^④,这种并“不对等”的税制很快为部分茶商利用,且“最常用的办法是冒称其货物为某一外商所有”^⑤,其本质实为“多抗不完纳厘金”^⑥,结果以致于“守分者不能获利,多依附洋人而变为奸商”^⑦。洋商往往亦观察时变,因“申请子口单用以代替缴纳地方税捐,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权利。”^⑧更有甚者,双方还时有勾结,致“通商口岸洋行如林,其具真洋商东家,十中不过一二。”^⑨结果“自有洋票以来,中国奸商辄借此为护符,厘金已因此减色,……从此外人益得居奇获利,而中国税厘并归无着矣。”^⑩对此,时人陈炽一针见血地指出:

洋货入口,一税一半税之外一无稽阻。西商偶到,趋媚不遑,所以待外人者如彼其厚。土货则口口而查之,节节而税之,恶声厉色,百计留难,甚则加以鞭扑,所以待己民者如此其薄。黠商乃赁其牌号倚为护符,三联税单充斥内地,厘局无如何也。倚洋人则生,否则死;冒洋人则安,否则危。^⑪

对于皖南茶商而言,据曾氏所订“章程十条”可知,皖南茶捐厘税“已较道光年间正课加至七倍之多。”^⑫因此,华洋勾结规避茶厘以相互获利的情况在皖南地带也时有发生。譬如,当时因“胡光裕刻薄肥私,每收茶捐,格外挑斥银色,动辄留难数日,借补银色为名,以充私表,而过秤又不公平”,致福德泉茶庄、鸿兴信等庄以“代宝顺洋商办茶”,或称“领洋商资本”为由“冒充洋商”一案就相当典型^⑬。此后,又有徽州某茶商“贩道毛茶二万七千四百三十斤,计四百二十二袋,指为英商立德贩运之茶”。但据江西九江关查明“四月十一日,英商立德请发空白土货报单运照各二十件,往徽州办茶;四月十八日,英商立德请发报单运照各三件,往义宁州办茶;五月十七日,英商立德请发报单运照各三件,六月初十日,又请发报单运照各三件,均往婺源办茶”。此种华商报为英商贩茶,而英商以“一商人请领单照数十件”状况,两者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213页。

② [清]薛福成:《薛福成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页。

③ [清]麦仲华:《皇朝经世文新编》卷10《中国商埠情形记》,上海日新社印,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④ [清]马建忠:《适可斋记言》,中华书局,1960年,第77页。

⑤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42页。

⑥ [清]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第227页。

⑦ [清]葛士濬:《皇朝经世文续编》卷116《论税务》,光绪十七年刻本。

⑧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836页。

⑨ [清]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济文编》卷45《论商困》,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⑩ 刘坤一:《龙江各关税务仍请缓征折》,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刘坤一集》第1册,岳麓书社,2018年,第427页。

⑪ [清]陈炽:《庸书·内篇》卷上《厘金》,出版社不详,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⑫ 《皖南茶税请免改厘增课全案录》,转自康健:《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230页。

⑬ 曾国藩:《批江西牙厘局禀洋商运茶完纳子口半税江省捐厘无抽由》,时间不详,《曾国藩全集》第13册,第541页。

之间内在的事实“显系华商私买洋人单照,串通把持”^①。再如,咸丰十一年十月,祁门某茶号挟洋商之势“到营索退捐款,意欲连徽郡向章茶捐茶厘银九钱一概不认”,乃至最后惊动总理衙门^②。徽州府如此,徽州府周边之太平县也如出一辙,其“奸商挟借洋势,百计绕越偷漏”茶税亦时有发生^③。

面对华洋茶商勾结避税的严峻事实,曾氏力图予以整治。前引胡光裕案,曾国藩以“内地城镇,约内本无外国商人进内开行之条”为由据理力争,认为洋人请领单照运茶,不可阻华商缴捐,华商持护票为据,洋商执运照为凭,宝顺等行更不可借洋商之名自居。然而,当遭领事狡执干预后,曾氏只好“谨守条约,与之辩论”,该案最后仅以“撒去胡光裕”告终,但事实上此案终致当年茶捐银数少收万金之多,却是不争的事实^④。又如,面对祁门茶商索捐,曾氏以该商系“本地贩茶之商人,与收买之洋商无涉”敦促僚属姚体备“迅将此案讯结”,不过终因该商“借夷势以抗官”,只好忍气吞声以“完结”^⑤。此外,面对太平奸商挟借洋势,绕越偷漏,曾氏更是焦头烂额,痛感“凡关涉夷务者,皆初则壮于愤,后则缄其口”,只好告诫姚体备“以宽舒处之”,乃至慨叹“吾既不能痛惩奸宄,故姑就彼听乐从者而立之制”^⑥。事实上,鉴于华洋茶商勾结规避茶厘之举,早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户部就曾饬咨文两湖、两江、浙江、福建等地将茶厘捐合并于产茶之区改征“落地税”。但因军务等因素缠身,曾氏迟迟未能按章办理。同治二年,鉴于两江等地狡黠之商时有“影射偷漏”之举,加之“茶捐一事,多不请奖,全系移奖戚友”的猫腻。曾氏改弦更张始于义宁州等地照户部咨文,改征落地税,认为此举“洋商不得借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厘,亦免致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⑦,但“洋人纷纷不服”。对此,曾氏亦只能敷衍地表示“新章落地税应改之处,准由该道禀请酌改,但须与前次贴出告示不相矛盾”^⑧。尽管如此,此章亦只辖江西义宁等地,而皖南等地在曾氏执政期间始终未能改征落地税。由此可见,曾氏整治华洋茶商勾结规避皖南茶捐厘税效果不佳。直至同治五年(1866)五月,继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终将皖南茶捐厘税合并统征落地税,并遵循原订“二两四钱八分”之例^⑨。然终究无法规避华洋茶商勾结逃避捐厘之举,直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不肖华商,贿赂牌照,假托洋商之名,洋商出售保单,坐收华商之利”现象依然屡见不鲜^⑩。

其次,对于两江督宪而言,皖南茶捐厘税厘革的结果绝非解决临时军需那么简单,关键在于此举搁置了明清以来徽茶运销“按引征课”的既有惯例,使继任官宪可能轻松地逾越旧制,进而借助“以助饷需”的名义顺理成章地调适茶捐厘税乃至获取捐厘外的“溢出”利益,这本系权宜之举却意外成为后来两江督宪经制外的重要财源。事实上,光绪中叶后,国际市场上华茶滞销,价格不昂,减轻茶捐厘税成为茶商的迫切呼吁。然而,皖南茶捐厘费不仅未能实际蠲减,反而成为地方官吏获取新政经费需求的重要觊觎目标。以宣统三年(1911)皖赣铁路宣屯段兴修为例,官方力图于茶捐厘税外采用发行股票的方式募集资金并饬令婺源、祁门、浮梁、铜石、泾太、饶州、建德、街口茶商认股3080张。两江总督张人骏饬令“茶股仍照原案,统归贵局代收”,试图“官收官管”,此举与皖南茶商“自认自存”计划背离甚远^⑪。值得一提的是,铁路股票认购尚未解决,地方官员又企图另征矿务茶股,此举无异于厝火积薪,结果引发皖南茶商

① 曾国藩:《批景德镇牙厘局禀遵示更抽收洋华商茶税是否错误由》,时间不详,《曾国藩全集》第13册,第542页。

② 转自张金栋:《曾国藩等致姚体备信札考释(中)》,《文物春秋》2013年第2期。

③ 曾国藩:《复姚体备》,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5册,第312页。

④ 曾国藩:《批江西牙厘局禀洋商运茶完纳子口半税江省捐厘无抽由》,时间不详,《曾国藩全集》第13册,第541页。

⑤ 曾国藩:《复姚体备》,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曾国藩全集》第24册,第581页。

⑥ 曾国藩:《复姚体备》,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5册,第312页。

⑦ 曾国藩:《江西遵按户部章程征收茶叶落地税片》,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全集》第6册,第372页。

⑧ 曾国藩:《复沈葆楨》,同治二年八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第27册,第128页。

⑨ 《重修安徽通志》卷78《关榷》,光绪四年刻本。

⑩ [清]求自强斋主人:《皇朝经世文四编》卷23《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覆求商务疏》,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⑪ 《宣统三年三月札发铁路三联单》,原件现由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长陈琪先生收藏。

更为强烈的抗议。以祁门胡元龙为首的茶商联合禀呈，茶税皖南独重，成本洋庄最大，今铁路刚刚复股，矿股又紧随而至，商力势必闭歇。故“主持矿务者纵不为茶商计，独不为亿万衣茶食茶之祁民计乎？……现值商战剧烈时期，朝廷整顿商务，务期发达，乃不能体恤之，而反以重困之！商力有限，几有应接不暇之势。”^①茶商抵制矿务茶股结果如何，因资料匮乏，不得而知。不过，此举说明，围绕着曾氏茶捐厘税厘革引发的皖南茶税征收及其“溢出”利益时常为地方官宪觊觎，成为权力体系和业茶者之间利益博弈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实，就曾氏而言，本是中枢策略的执行者，美国学者芮玛丽认为，晚清社会变迁为其崛起提供了良机，咸同兵燹证明了湘军存在的价值，清廷难以派出合格大员去统领旧式清军，结果“产生了新的军政领袖和新式军队”，由此，曾氏一揽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政大权^②。为应对不时之需，曾氏开征茶捐厘税于晚清权力中枢来说合情、合理，当然也是合法；其机构设置、人员任用、规章制订执行、奖励措施的颁布等，亦符合权力体系的利益。就业茶者而言，原系权力架构的底层，产销获利，缴纳正课皆系正常。但当遭遇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境迁，晚清朝廷于“华”“夷”执行内外有别的双重税制，近代皖南茶商穿梭于锋镝之间，周旋于官商之间，静观时变，谋定而动，税则轻，乐从之，税则重，规避之。茶捐厘税之征将之与权力体系之间演变为两者间利益的相互博弈。总之，曾氏的茶捐厘税厘革及其后继者诸多举措自有维持军饷和补充地方政务经费不足的特殊利益考量。业茶者乐从也好，规避也罢，他们只是权力架构底层利益的博弈者，既未完全倾向中央策略，也非完全支持地方官宪举措。如果说曾氏茶厘茶捐征收结果差强人意，除其策略的可行性外，关键在于当时国际市场的投机性需求量的攀升和不菲的价格。但因时局变迁，加之苛重的税制，致华洋勾结规避茶厘不可避免且终究无法切断。后清廷“改厘增课”本是将过去临时性的举措变为常课，但恰恰触动了茶商本已难以为继的薄利。因此，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皖南茶“改厘增课”“呼裁捐厘”之举等终有始无终。

结 语

晚清皖南茶捐厘税的征收是源于咸同兵燹军需筹措迫不得已的临时之举，曾国藩在人力配备、机构设置、章程制定以及激励机制等诸多方面采取措施以确保茶税的正常征收，进而为饷需提供必要的保障。表面上看，曾氏之举确实收到了保障军需等应有效果。然而，毕竟晚清捐厘与税有别，捐厘繁杂且多属地方性财政，往往征收较为随意，不易监督。

据现有的文书看，尽管两江督宪和牙厘局等为此颁布各类《告示》以防止执吏无端需索和茶号等私自馈送，但皖南茶叶在实际经营与运销过程中始终难以避免类似避税事件的发生^③。究其缘由，在于官方为此设立的厘卡等负责督察的司勇巡丁时常以种种手段阻碍茶叶贸易的正常运销，这是晚清茶捐厘税征收不可避免的遗害之一，为求贸易顺畅，不正当的官商间勾结为运销避税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同时，华洋商人贩运茶叶，公开竞争本是公平原则体制下的应有之义，但近代社会变迁视域下，华洋商人时常享有不对等的竞争原则，亦因之，华洋勾结逃避捐厘已然成为晚清皖南茶叶运销进程中难以控驭和解决的顽疾。此外，曾氏为保障军饷的皖南茶捐厘税抽收临时之举，却意外地成为后来两江督宪经制外的

（下转第137页）

①《申覆茶商实难认缴矿股据禀录》，原件现由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长陈琪先生收藏。

②[美]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房德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5页。

③《两江总督曾〔国藩〕为皖南茶捐不准多取分文告示》、《徽州牙厘分局为茶引正项经费之外不准额外私取分毫告示》、《两江总督马〔新贻〕为皖南茶捐各衙门暨各局卡不准多取分文告示》，封越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散件文书》第4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07、208、212页。